

荆楚故書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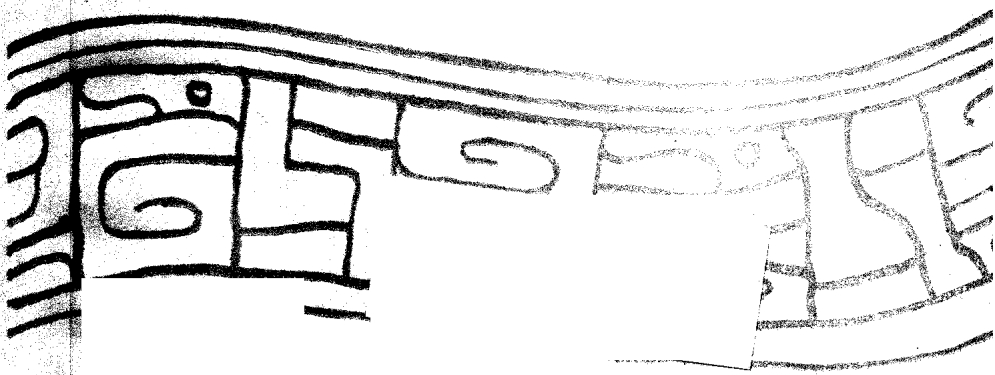
襄陽耆旧記校注

刁蕾齒原著

·荆楚故书丛刊·

习凿齿 原著
舒 焚 校注
张林川

襄阳耆旧记校注



1105169

襄阳耆旧记校注

习凿齿 原著 舒 樊 校注
张林川

荆楚书社出版 总发行在湖北发行所发行
湖北人民出版社蒲圻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3.625印张 2插页 220,000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统一书号：11438·2 定价：2.70元

【照排胶印】

前 言

（一）作者、书名

《襄阳耆旧记》，人们从南朝以来的古籍记载中，早已知为东晋习凿齿所写。

习凿齿，字彦威，襄阳人。他的生年大约在西晋怀帝司马炽、愍帝司马邺（分别于公元306—313年、313—316年在位）时期，死年是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太元九年（384年）。他是一个史学家，写有《汉晋春秋》、《逸人高士传》以及本书等。他对三国时期的政治史，主张尊汉黜魏，认为：蜀汉皇帝是东汉宗室，应为正统；曹魏虽受汉禅，又禅于晋，毕竟仍是篡逆；到司马昭在魏执政时灭了蜀汉，才算汉亡，并应把这视为晋的始兴。《晋书》本传以及其他旧史书认为，他的这一观点，是为了反对当时很有武功的权臣桓温企图取代晋的野心。应该说，他作为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更是为了在西晋末年已开始的、不断激化着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中，竭力解说司马氏得天下之“正”，从而巩固东晋在南方的统治。他曾经先后任荆州刺史桓温的从事、别驾、户曹参军，以及短暂时期的荜阳太守。然后，就回襄阳从事著述。氐族贵族首领前秦宣昭帝苻坚攻取了襄阳时，曾经把他带走；他因有病，又回襄阳。东晋收复襄阳，准备叫他负责“国史”事宜，可是他已病死了。

他所写的《襄阳耆旧记》，《隋书》、两《唐书》和《宋史》都有著录。《隋书·经籍志二》“杂传”类为“《襄阳耆旧记》五卷，习凿齿撰”；《旧唐书·经籍志上》“杂传”类为“《襄阳耆旧传》五卷，习凿齿撰”；《新唐书·艺文志二》“杂传记”类为“习凿齿《襄阳耆旧传》五卷”；《宋史·艺文志二》“传记”类为“习凿齿《襄阳耆旧记》五卷”。书名或为“记”，或为“传”。

这些著录表明，本书到两宋时期还完整地存在着，虽然传抄中已有不少歧异了。《三国志》、《后汉书》、《世说新语》、《文选》各书的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等书的有关部分，都对本书有所征引。征引时，时而把书名称为《襄阳耆旧记》，时而称为《襄阳耆旧传》，有的又简称之为《襄阳记》。即使在同一书中，所引书名也不统一。例如《御览》所引，既有多处作《襄阳耆旧记》或《襄阳耆旧传》，又有多处作《襄阳记》。《三国志》注所引都作《襄阳记》。

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以《襄阳记》为书名的作者，不只习凿齿一人。还有一个郭仲产，本书卷第四《乐宅戍》的文字就是清末吴庆焘辑自《水经》酈注所引的“郭仲产《襄阳记》”。

说郭仲产写有《襄阳记》的，不只是《水经》酈注。《湖北通志·艺文·外编》（卷九一），就据陈直斋《书录解题》说，唐吴从政的《襄沔记》是“删宗懔《荆楚岁时记》……习凿齿《襄阳耆旧传》、郭仲产《襄阳记》”等书“集成”。

郭仲产，事迹不详。《渚宫旧事》有“郭仲产宅在江陵

城东十五里”的记载：从他的著作看，他又对襄阳以至荆州地区史地很熟悉，因而他可能就是荆州人，他生活的时期是南朝。对其著作的著录，《隋书·经籍志二》“地理”类有“《湘州记》一卷，郭仲产撰”；《旧唐书·经籍志上》“地理”类有“《南雍州记》三卷，郭仲彦撰”；《新唐书·艺文志二》“地理”类有“郭仲产《荆州记》二卷”。《宋史·艺文志》已无著录。《隋书》的“郭仲产”本来作“郭仲彦”，标点本据《史通·正史篇》和《崇文总目》改。可见郭仲产、郭仲彦是同一人。所以，颇疑《隋书》和两《唐书》所著录的也是同一书，因为如果是三部不同的书，《隋书》和两《唐书》不会先后恰恰分别只著录其一书。又颇疑《水经》酈注所引的“郭仲产《襄阳记》”就是《南雍州记》的别名。东晋孝武帝司马曜时在襄阳侨置雍州，南朝宋文帝刘义隆时割荆州北部为这一雍州的辖境。这一雍州，是在原有的雍州即东汉末始分凉州置的雍州之南，所以被称为南雍州；其辖境就是襄阳地区及其以北一部分地区。

本书卷第三《马仁陂》和卷第四《战地》、《张平子碑》、《三公城》各篇，依次分别是吴庆焘辑自《水经》酈注所引的“郭仲产曰”、《寰宇记》所引的“郭仲产”、《水经》酈注所引的“盛弘之、郭仲产并云”以及同书注所引的“郭仲产言”。这些，当人都指的是郭仲产《南雍州记》，即以《襄阳记》为别名之书；“盛弘之、郭仲产并云”则指两人分别写出的同名著作《荆州记》，或郭仲产《南雍州记》中与《荆州记》相同的文字。《南雍州记》这一书名，也有别的作者采用。《隋书·经籍志二》有“《南雍州记》六卷，鲍至撰”；《新唐书·艺文志二》有“鲍坚《南雍州记》三

卷”。鲍至、鲍坚当为同一人。但各本及各书中，对待他，并未象对待郭仲产那样不止一处地显示出，习凿齿所写的本书曾经为其所增写。

卷第三《望楚山》，是我们在校注过程中新辑的几篇之一，辑自《御览·地部·山》所引的“《襄阳记》曰”。文中记述的是南朝宋之事，显然不是习凿齿所写，这里的“《襄阳记》曰”当指的是郭仲产《襄阳记》。

于此可见，习凿齿写了《襄阳耆旧记》，或曰《襄阳耆旧传》，或曰《襄阳记》；而郭仲产又以其另一《襄阳记》当即《南雍州记》增写了习凿齿所写的本书。

然而习凿齿以后的作者，增写本书的实际上又不只郭仲产一人。元末明初人陶宗仪所编的《说郛》，收有《襄阳耆旧传》，《传》中有韩系伯、郭祖深、蔡道贵、鱼弘（现收入卷第二）。韩等四人是南朝齐、梁时人，这些文字自然不是习凿齿所写，而或为郭仲产、或其他作者所增写。

我们在校注过程中，还发现《舆地纪胜》引有《尹怱》一篇，文前有“《襄阳耆旧传》云”六字（现也收入卷第二）。尹怱是唐朝人，文字的增写当然更是比郭仲产又晚很多的作者之所为。

于此可见，郭仲产以后，还有其他作者增写了本书。

这么说来，《襄阳耆旧记》或《襄阳耆旧传》、《襄阳记》既然本为习凿齿所写，那么，把其中郭仲产以及其他人的文字统统剔除，岂不好吗？我们在校注过程中，对此也反复考虑过，后来感到这毕竟不大相宜。因为，一则至少到了唐末宋初，郭仲产等人的文字已经长期属入本书。例如《太平御览·地部·山》所引《襄阳记》的文字，前后相连共有

三处，分别是对望楚山、石梁山、薤山的记述，其中对望楚山的记述就是上面提到的、关于南朝宋时的记事。这样的文字早已成为本书的组成部分，与习凿齿所写不可也不易分开。二则在习凿齿以后，长时期内有其他的作者增写本书，足见本书有其一定意义上的价值和生命力。增写的文字正显示了这一点。三则习凿齿以后襄阳地区的某些人、某些事物，因有对本书的增写而增加了记录，并附骥于本书，这也是好事吧。

所以，感到对于增写的文字，需要做的事情当是逐渐把它们从已辑出或待辑出的文字中寻找出来，并逐渐把它们的情况了解清楚，而不是简单地剔除。

（二）卷数、辑佚、篇目

本书的卷数，《隋书》、两《唐书》和《宋史》的著录，都是五卷，已见上述。

《文献通考·经籍·史·传记》（卷一九八）说：“《襄阳耆旧记》五卷。晁氏（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曰：‘晋习凿齿撰。前载襄阳人物，中载其山川、城邑，后载其牧守。’

《隋经籍志》曰《耆旧记》，《唐艺文志》曰《耆旧传》。观其书，记录丛脞，非传体也，名当从《经籍志》云。”马端临继续肯定本书为五卷，晁公武第一次指出了本书的大致内容。

本书在南宋时虽然还有完整的本子存在，但可能其常见的本子已不是完整的本子。南宋人曾慥的《类说》，摘有《襄阳耆旧传》十一条（“精魂为芝”、“牵羊坛”、“竹器”、“槎头缩颈鳊”、“玉镜玉簪”、“呼鹰台”、“龙种来归”、“千头木

奴”、“拜庞德”、“三公峰”、“冠盖山”），内容很不集中，可能是从不完整的本子中所摘，没有多大选择余地了。元末明初的陶宗仪在其《说郛》中收入了本书一部分人物的记述，这些，是从本书完整的本子摘取的呢，抑或是从不完整的本子全部照录的呢？还不清楚。不过，经过元、明之际和明、清之际的动乱，本书在各地更为少见了。约在明朝嘉靖末至万历初，襄阳地区宜城人胡价在浙江临海发现南宋人吴琚在那里做知州时刊刻的本书木版，印出少量成书带回。这个本子，到清朝康熙年间编纂《渊鉴类函》时，可能没有被发现和利用，《类函》中所引本书文字当是转引自他书，否则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其中不会没有本书或存目的。

《四库全书》编纂完竣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然后，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任兆麟才把他家藏的临海本（其中已无山川、城邑）作了增辑，成为三卷，收入于其《心斋十种》（内容见下《重辑襄阳耆旧记序》注5）。到了清末，王仁俊有辑佚一卷，仅有稿本，未曾刊印，很难见到。张之洞委托缪荃荪写的《书目答问》中也没有提到《心斋》本以外的本子。曾经是张之洞门生的吴庆焘，才在《心斋》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增辑为五卷，收入于其《襄阳四略》（清光绪三十二年即1906年刻本二十五卷。内《艺文略》五卷及附录一卷，《兵事略》六卷，《金石略》十二卷，《沿革略》一卷，附《耆旧记》五卷）。

《二十五史补编》中，有文廷式、吴士鉴、黄逢元三人分别对本书的著录。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卷二）据张金吾《藏书志》说：“今存一卷。”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卷二）说：“五卷。……两《唐志》‘记’误作‘传’。今

从《隋志》。《水经》注、《文选》注、《太平御览》引作《襄阳记》。”没有说尚存卷数。黄逢元《补晋书艺文志》（卷二）说：“今存三卷。”

文廷式说张金吾所见仅一卷，当指《类说》所摘或《说郛》本。黄逢元所见为三卷当指《心斋》本。

《湖北通志·艺文·史部》（卷八十）“《襄阳耆旧记》五卷”下，在引《隋书经籍志考证》后的案语中说：“《皕（bi）宋楼藏书志》（清末陆心源著）有“宋人重编本一卷。绍熙元年（1190年）襄阳守（襄州知州）延陵（今江苏丹阳西南，一指今常州市）吴涪序云，系漕司（指两宋时转运使的官署）旧版。今存任兆麟辑本三卷。”吴涪当即曾任台州知州的吴琚。这里所说“重编本一卷”，如果不是指《类说》所摘，当是另一后已不传的本子，而吴琚在襄州任知州时，襄州尚有其“漕司旧版”。

已佚其名的一位明朝人编有《五朝小说》，其中收有习凿齿所写的本书。可惜这一套书后来已不存在，不知道它收了本书多少文字。清朝时期根据《说郛》、《说郛续》重编了这一套书，其所收本书文字不会超出《说郛》。民国十五年（1926年）的石印本《五朝小说大观》，即《五朝小说》而于书名中添了两字者。其中所收本书，果然与《说郛》清顺治三年（1646年）本相同。

《说郛》本来共为一百二十号（juǎn，卷帙的卷）。后来重编为一百卷，有民国十六年（1927年）排印本。习凿齿所写的本书以《襄阳记》的书名被收入其卷四《墨娥漫录》之下，仅有三条：一是黄承彦事，一是“诸葛亮初亡”，习隆、向充等共上表请立庙事，一是“世纪荀巨伯”事。前两条都是《三

国志·诸葛亮传》裴注所已有，第二条文字少于裴注甚多，第一条原《说郛》中的《襄阳耆旧传》已收。后一条实为《世说新语·德行》“荀巨伯”条的摘录，“世纪”即“《世说》”之讹，而《德行》篇刘孝标注引《荀氏家传》：荀巨伯“亦出颍川”，并非襄阳人。

因此，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保留习凿齿所写本书较多文字的书，还是原《说郛》即其清顺治本。《五朝小说》的后身《大观》所传，就是这个《说郛》本。后来《心斋》本使久已埋没的临海本得到增辑。吴本又使《心斋》本进一步得到增辑，从卷数上恢复了旧观。

《说郛》、《大观》、《心斋》三本及吴庆焘本的卷数、篇目分别如下：

《说郛》本《襄阳耆旧传》，不分卷，收入十八人（次序依原书，下各书同）：宋玉、庞德公、庞统、王逸、蔡瑁、杨虑、繁仲皇、习融、习温、黄承彦、马良、廖化、董恢、李衡、韩系伯、郭祖深、蔡道贵、鱼弘。每人一篇，篇前无篇目，书前无目录。

《大观》本《襄阳耆旧传》，与《说郛》本同。

《心斋》本《襄阳耆旧记》，三卷，收入四十二人。卷第一，人物：周宋玉，汉王逸、王延寿、庞德公、庞统、庞林、习、蔡瑁、杨虑、杨仪、繁仲皇、习融、习询、习嵩、习承业、习珍、习温、黄承彦。卷第二，人物：汉马良、马谡、杨颉、向朗、向条、向宠、向充、廖化、董恢、张悌、李衡、晋罗宪、罗尚、蒯钦、习竣、邓攸。卷第三，牧守：汉胡烈，晋羊祜、杜预、山简、李重、刘弘、桓宣、邓遐、朱序。以上襄阳人物三十三人，襄阳牧守九人。每人一篇，

篇前无篇目，书前有目录；目录中有各篇篇目，其中缺繁仲皇、邓攸。习凿齿主张以晋继汉，以汉继周，所以对三国时的人都视为汉朝人，对蜀汉被灭后的魏国人都视为晋朝人。

吴庆焘本《襄阳耆旧记》，五卷。这是在《心斋》本的基础上增辑而成的、辑佚最多的本子。收入四十六人，山川、城邑等二十八处（内一处有目无文），以及不知何篇的佚文一条。卷第一，人物：在《心斋》本卷第一基础上，把汉习融提到王逸之前，在黄承彦之后增习祯。卷第二，人物：在《心斋》本卷第二基础上，在汉李衡之后增胡宜、王昌，在晋习嘏之后增邓攸、黄穆、大中正（不是人的姓名，而是官名，吴庆焘认为其文字是不知何篇的佚文）。卷第三，山川：鹿门山、中卢山、岷山、万山、荆山、蕪山、石梁山、冠盖山、洧水、沔水（有目无文）、檀溪、马仁陂，以及作为“附见”的巫山、夏水。全卷是增辑的。卷第四，城邑：北津、战地、柵中、松子亭、牵羊坛、活国城、乐宅戌、张平子碑、三公城、诸葛女郎墓、秦颀冢、熨斗陂、木兰桥、黎丘。全卷是增辑的。卷第五，牧守：同《心斋》本。以上襄阳的人物三十七人，不知何篇的佚文一条，襄阳的山川十二处（内一处有目无文），附见的山川两处，襄阳的城邑及其他（有的不能算是城邑）十四处，襄阳的牧守九人。每人或每处为一篇，篇前无篇目，书前有目录，目录中有各篇篇目。

各本记述的襄阳人物，其实不只上述那些。《说郛》、《大观》两本，《王逸》实包括子王延寿，《庞德公》实包括子庞仙民、孙庞焕，《杨虑》实包括同里人许洗（应为“许汜”），《习融》实包括子习郁，《李衡》实包括妻习英习。《心斋》本，《蔡瑁》实包括刘表之子刘琦，《杨虑》

实包括许洗（见上），《习融》实包括习郁，《习询》实包括习竺，《习温》实包括子习字，《李衡》实包括习英习，《罗宪》实包括父罗蒙、子罗袭、孙罗徽；而《王逸》已分为《王逸》、《王延寿》两篇。吴本，《习融》实包括习郁，《庞德公》实包括庞仙民、庞焕，《蔡瑁》实包括刘琦，《杨虑》实包括许洗，《习询》实包括习竺，《习温》实包括习字，《习祯》实包括子习忠、孙习隆，《马良》实包括子马秉，《李衡》实包括习英习，《王昌》实包括其母，《罗宪》实包括罗蒙、罗袭、罗徽，《黄穆》实包括弟黄奂，《尹怱》实包括父尹嗣宗、子尹恭先、孙尹仁恕。各篇对被包括者的记述详略不一，有的较详，有的极略。

《心斋》本及吴本是有目录的。前者目录中的篇目，对各篇中被包括记述者一律不予标出；后者目录中则以小字标出其一部分，有《习融子郁》（“郁”讹作“郡”）、《杨虑许洗》、《习询习竺》、《习温子字》、《习祯子忠子隆》、《王昌昌母》，其余未标出。

《心斋》本及吴本记述的襄阳牧守，其中有一篇也有被包括记述者，这就是《朱序》，实包括对其母的记述。两本的目录均未标出。

（三）内容、价值

从习凿齿所写的人与地，可以看到：

一、习凿齿是以东汉末所置的襄阳郡为“地”的范围，以战国至他所处的当时为“史”的时限来写的。汉献帝刘协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分南郡的北部和南阳郡的很小一部分，置襄阳郡。辖境约当今湖北襄樊市区、襄阳县二者

汉水以南之地，襄阳县汉水以北的西北部分，谷城县一小部，以及南漳、宜城、当阳、远安等县；治所襄阳，是早自西汉就有了的一个县，今为襄樊市区汉水以南的一部分。习凿齿所写的人，除牧守外，绝大多数记述为“襄阳人”，襄阳指郡，或指县；有的是“宜城人”、“中卢人”，指家在今宜城或宜城县境。全书第一个写的襄阳人物宋玉，是战国时的楚人；最后写的襄阳牧守朱序，与习凿齿自己同时。没有西汉时期的人；三国、特别是蜀汉时人最多，东汉、西晋时人次之，东晋时人又次之。这可以说是习凿齿对他那个时代襄阳地区一部分古今人物、牧守、山川、城邑等的记述。

可以辨认为郭仲产以及佚名的其他作者增写的文字，与习凿齿所写相比，显示出时代大都较晚或很晚，为南朝以至唐朝；地区也较为向北推进。卷第四《乐宅戍》、《张平子碑》、《三公城》三篇，所记述的地方是今河南南阳市及其以北。这些地方正在南朝宋文帝刘义隆时割荆州北部为境的南雍州的范围。南雍州辖境约当今北至河南淅川、内乡、方城，东至河南泌阳及湖北大洪山，西至湖北均县、南漳，南至湖北钟祥以北的地区。郭仲产《南雍州记》自然要记述这一范围内的历史地理情况。习凿齿却没有对西汉时的堵阳（今河南方城）人张释之、东汉时的西鄂（今河南南阳市北）人张衡这样的著名人物加以记述，他是谨守着东汉末襄阳郡的范围的。

二、习凿齿所写的襄阳当地人物，从他们在各该当时所从事的活动、所具有的社会地位而言，包括的面很广。他们中间，有文人、隐士、谋士、重臣、属官、州郡长吏、各级武职、一般朝臣，以及上层妇女等。他们与牧守一起，自然都是当时封建地主阶级人物。然而，封建地主阶级占居统治

地位，是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所使然；封建地主阶级人物中也有值得历史地加以肯定的。习凿齿为之作记述的这些人，其中一大部分都各自有其值得称扬之处。例如宋玉那样为我国古典文学增添光华，王逸那样为屈、宋以来的楚辞编注专集；庞统那样唯恐遗落地举才，习温那样不从流俗地责子；向宠那样常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杨仪那样娴于处理繁剧，“斯须便了”；胡宜那样为官清廉，使“妻不衣帛”，杨颙那样敢于直谏，使丞相称谢；庞德公那样识才于“朴钝”，黄承彦那样择婿以嫁女；李衡那样留意种植柑桔林，向充那样主张纪念诸葛亮；向朗那样年逾八十，仍能潜心典籍，杨虑那样年才十七，居然为人师表；王昌母那样的家教，习英习那样的识见；习珍那样不肯投降，罗宪那样对付艰局，……以及牧守中羊祜、杜预那样，或兴教育，安远近，遗爱在民，或建学校，办水利，造福一方；刘弘那样关心百姓、老卒的疾苦，朱序那样促成淝水之战的胜负；都是足以在不同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称道的。

三、习凿齿对于某些对当时人民过于苛虐者，在为人处事中言行不当足以为戒者，以及表现了突出的迷信思想的事，也作了记述。关于前两者，卷第二《罗尚》中，有蜀地人民对罗尚的贪暴恨之如骨，作出“蜀贼（指流民的起义）尚可，罗尚杀我”的歌谣；卷第一《杨仪》中，有杨仪、魏延不和及杨仪居功怨谤因而导致的可叹结局。关于后者，卷第一《习融子郁》中，有习郁与东汉光武帝刘秀都梦见了苏岭山神，刘秀竟因而为他加官晋爵；卷第二《向充》、《蒯钦》中，有向充、蒯钦竟以谶语解释当时的时事变化；卷第四《秦颉冢》中，有秦颉生前既因迷信风水而想占有别人的家宅

做自己的坟地，死后其棺材运到那里后又居然不能再运走等。

本书无论在史学上，还是在文学上，可以说都有其一定的价值。

首先，在史学上。习凿齿作为东晋的一个史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汉晋春秋》已经亡佚，他的《逸人高士传》也已无存。连同本书在内，都靠各书的援引，以见其所写的片段。本书是他写的襄阳地区人与地的记述，提供了战国至东晋、特别是东汉至三国那一地区的史料，表示了他的历史观点。援引它的各书中，只说较早的《三国志·蜀志》裴注，就援引了十几处之多，都指明为“《襄阳记》曰”；而仅指为“习凿齿曰”的还未计在内。象向充、黄承彦、庞林之妻习氏、马谡、董恢、罗宪、向朗、向条、向充、杨顺、习祯、习忠、习隆等人事迹的全部或一部，都靠裴注所引本书的文字提供。其中一部分引文又是大段文字，例如关于罗宪的记述，达六百余字之多，没有这一记述，就不可能了解罗宪所处的时势及其全部活动。《柵中》、《木兰桥》等篇记述了农业、畜牧业生产情况；《罗尚》、《蔡瑁》等篇显示了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一角。各该时期的某些风尚、思潮，本书中也有所记述。习凿齿的历史观点，从记述三国蜀汉人物特别多这一点上也得到了表现。

其次，在文学上。本书中有对人物性格及其环境的精彩描绘，有读来饶有兴味、琅琅上口的篇章。如果说，《宋玉》一篇还主要有宋玉本人的作品为依据；那么，象《庞德公》等篇就完全是习凿齿用自己的笔墨来对人物进行记述了。刘表请庞德公出来做官，他不肯；刘表亲自去看他，给他谈话，

劝他出来，他说了一派引古以喻当时的道理，使刘表只好“叹息而去”。司马徽到他家去，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要酒要菜；他回来后，与客人们坐在一起，主客无别，“不知何者是客也”。庞德公的隐遁思想不一定值得崇尚，但文字写得很好，读时使人神往。《杨颢》一篇，写身为属官的杨颢看见丞相诸葛亮实在过于操劳，迳入其办公室内，侃侃而谈，批评诸葛亮事必躬亲的不当。虽然他把奴婢与牛马、鸡犬等而视之，今天读来不好接受，然而这也正是那时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诸葛亮这么一位为其所服务的蜀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极可尊敬的人，面对批评，悉心以听，听后表示虚心接受；杨颢病死，为之哭泣三日。这些，写得实在令人感动。

《王昌》一篇，写王昌的母亲家教甚严，不许晚辈穿用超出规定，使得亲家公尚书令桓阶的儿子都对她有所忌惮，文字简炼，写得栩栩如生。这样的情况，书中也还不少。

习凿齿所写的本书，受到他以后历代人们的重视。唐朝诗人中，与家在襄阳的皮日休齐名的陆龟蒙，有《读〈襄阳耆旧传〉》一诗：“汉水碧于天，南荆廓然秀。卢、罗（襄阳地区有古卢、罗二国地）遵古俗，鄢郢迷昔囿。自从宋玉贤，特立冠耆旧。”比陆龟蒙年代早些的伟大诗人杜甫，对襄阳及其人物感情很深，在《遣兴》诗中写到庞德公，说：“襄阳耆旧间，处士节独苦。”他们对本书内容的重视，本身就是对本书的很好评价。

（四）整理工作

一、校订

本书写成至今，已历一千数百年之久；开始残缺散佚，